

中美关系

美国不能依靠“绊线部队”来威慑中国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 11 月 7 日登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教授哈尔·布兰兹 (Hal Brands) 的文章称,“绊线部队”(tripwire forces) 只有在与一个可信的计划结合在一起时,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美国决策者需要更好的方法来保护台湾地区、波罗的海地区和南海的战略地带。文章摘要如下:

有学者认为,象征性部署不能真正起到威慑作用,因为敌人可以造成既成事实,即快速占领领土使对手没有机会反应。但也有人认为,“绊线部队”通过展示美国的承诺使入侵者感到恐惧。

如今,在台湾地区部署更多特种部队有助于减少“华盛顿是否会保护盟友免受无端攻击”的任何不确定性。但这些部署本身没有什么好处。如果美国不能真正保卫台湾地区——帮助其抵御空中和导弹袭击,向该地区大量部署海军和空中力量,那么大陆可能会认为美国的“绊线”只是虚张声势。仅把几十名美国士兵部署在台湾地区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大陆可以用小规模“入侵”制服这支部队,然后让华盛顿不敢做出升级冲突的回应。

当小规模军事部署是更广泛、可信的防御战略的一部分时,它们可以形成巨大的威慑,但当它们是防御战略的替代品时,它们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美国需要新的军事战略来应对中国

《华尔街日报》网站 11 月 2 日登载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权中心高级研究员塞思·克罗普西 (Seth Cropsey) 的文章称,美

国应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来应对中国，调整其军队结构和部署。

文章称，美国尚未阐明在与大陆的战争中获胜意味着什么。拜登政府的目标似乎是保持现状，捍卫所有太平洋国家的主权，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地区盟友的“领土”完整和航行自由。但要说服中国放弃其“咄咄逼人”的地区行为，就需要确定对中国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中国共产党渴望生存。

文章称，摧毁中国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是长期封锁。中国共产党明白，持续的经济低迷将引发动荡，可能压垮其内部安全。但实施封锁存在风险，尤其是因为这是一项长期战略，需要美国实施数月或数年。解放军也许认为它可以在战争初期摧毁足够多的美国战舰，从而使封锁无法进行。

封锁的替代方案是“向前作战”（fight forward），也就是“与敌人更近距离接触”。这意味着通过使大陆无法实现其短期行动目标来捍卫台湾地区和美国的盟友。这将需要美国在东亚部署比目前更多的海军和两栖基地。美国航空母舰必须配备远程反舰导弹，美国海军陆战队必须配备陆基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以阻止对台湾的两栖攻击。美国海军必须在关岛、横须贺、佐世保，或许还有澳大利亚的悉尼和珀斯部署更多潜艇。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中队必须被安置在第一岛链的新基地，由陆基防空导弹部队提供支持，以防止解放军立即获得制空权。实现该目标将需要对美国部队的结构和部署进行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彻底的调整。考虑到长期冲突的危险，这是更安全的战略选择。

约瑟夫·奈：用冷战类比中美关系是危险的

《纽约时报》网站 11 月 2 日登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文章称，就历史和政治而言，美国正与中

国处于冷战之中的思维是糟糕的，对美国的未来有害。

文章称，虽然拜登政府明智地抵制冷战框架，但其采取的行动表明，拜登政府与中国打交道的战略仍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而这将美国人的思维锁定在传统的二维博弈模型中。但是，美中竞争是一个三维博弈，其特点是在军事、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上分配权力。冷战的隐喻低估了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并提供了无效的策略，从而搅乱、误导了美国。

在经济层面，美中有着深刻的相互依存关系。美国和中国社会结构也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是一把双刃剑。它建立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很敏感的网络，这将鼓励谨慎。但它也创造了一些漏洞，北京和华盛顿都可以试图利用这些漏洞作为施加影响的工具。

除了上述因素，二维的思维定式假设美国能战胜中国，因为美国具有军事优势。虽然中国正推动其军队现代化，但美国仍然是唯一的全球大国。美国必须在传统的军事层面谨慎地规划横向行动，以保持亚洲的力量平衡，比如改善与印度的关系以及加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不能继续忽视经济或跨国层面上的不同权力，以及这些层面如何相互作用。

今天的政治竞争也与冷战时不同。美国及其盟友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受到共产主义输出的威胁。而且，中国“操纵”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体系，以支持其政府，并影响民主国家的舆论来反击批评。

不管怎样，美国陷入了与中国的“合作竞争”，这需要一种战略，能够同时进行竞争和合作。在国内，美国必须通过加大对研发的支持来强化其技术优势。在军事上，这意味着重组传统部队，纳入新技术，并加强联盟。在跨国问题上，美国需要加强和发展制度和国际条约来应对健康和气候问题。

美国需要在应对中国和其他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FA) 网站 11 月 2 日登载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 (Richard Fontaine) 的文章称, 只有平衡中国的“威胁”和美国在其他地区和问题上的利益, 美国才能有效地对抗中国的力量, 并加强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文章称, 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 而不是地区大国, 中国并不是它面临的唯一问题。美国在印太地区以外的持久利益也不仅仅来自与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华盛顿有必要优先考虑中国, 同时不让这种对中国的关注损害其他利益和优先事项。

在美国外交政策中, 突然将重点聚焦于中国的做法有先例。在冷战期间和之后几十年里的许多时间里, 美国都迅速围绕一个战略挑战达成共识, 这个挑战突然被认为比其他一切挑战都重要。根据通常的模式, 政策制定者宣布美国最近在其他地方的接触是浪费和无效的, 并决心立即发起大规模的全国努力, 以应对这一压倒一切的威胁。如今, 华盛顿的对华政策面临着类似的风险。问题不在于美国对中国能力和意图的评估, 而是它有可能排挤涉及其他国家和问题的重要关切。

美国需要在应对中国和其他利益之间寻求更大的平衡,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转向亚洲的机会成本。政策制定者应证明, 在中国和印太地区更多参与的好处超过在其他地方更少参与的可能成本。第二个原因涉及美中竞争的核心。美国只有与合作伙伴一起才能有效地与中国竞争, 在亚洲和欧洲都是如此。从长远来看, “跨大西洋分工”——欧洲照管欧洲大陆和中东, 使美国腾出资源聚焦亚太地区——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需要明白, 美国及其盟友在应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压力方面是团结一致的, 而且欧洲和中东需要美国的领导力来提供有效的长期稳定。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应与中国开展持续的竞争和校准的合作

美国需要构建一个持久的、跨党派的对华路径。该路径可以利用美国与亚欧盟友的合作关系，既包含持续的竞争，也包含校准的合作。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发布研究报告《应对挑战：引导竞争、避免危机、促进美国对华关系中的利益》。该报告是布鲁金斯学会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联合启动的有关“中美关系新框架与路线图”联合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两家智库分别推出了各自版本的研究报告。布鲁金斯学会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现在越来越表现为一个大国和竞争者，并相信美国正在衰落；在美国，中国也不再被视为一个偶然的竞争对手和潜在合作伙伴，而被视为美国最强大的挑战者和潜在对手。这种观点超越了党派界限，并被美国国内广泛接受。

美国需要构建一个持久的、跨党派的对华路径。该路径可以利用美国与亚欧盟友的深厚合作关系，既包含持续的竞争，也包含校准的合作。未来几十年中，管理美中关系的框架可以从以下三个原则入手：一是承认持续的战略竞争是两国关系的底线，不追求不切实际的友好合作，同时避免关系恶化为持续对抗和全面冲突；二是同时对威慑工具和外交危机管控、军控和避免战争的机制进行投资；三是就关键全球公共产品——金融稳定、流行病控制、减缓气候变化——展开校准的合作。

为建立一个持久的政策框架，加强美国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同时限制发生冲突的风险，报告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避免对美中关系的过度期望，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有关过去的浪漫主义观点和有关未来的宿命论都是不恰当的。双边合作可能会提供一些缓冲，但无法抵消利益和野心导致的关系

中国固有的竞争性质。

第二，承认政治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由于美国公众和国会山对中国的怀疑主义日渐强硬，任何有意愿推动对中国适应姿态的领导人都会面临政治成本。在中国，批评美国的民族主义声音也不断上升。这些趋势限制了任何一方缓和双边关系的政策空间。为了阻止双边关系的下行趋势，中美两国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大致对等的措施。

第三，明白美国的竞争优势。美国强大的相对地位应使其能够主动推进其全球角色的积极愿景，而不是对中国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努力摆出防御姿态。

第四，加强双边危机管控能力。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将发展可靠的机制来阻止、管控危机作为优先事项。

第五，避免把中俄推得更近。华盛顿可在未来就中俄间分歧较为突出的方面与其中一方展开接触，如北极航道问题。

第六，在全球背景下审视美中关系。两国都是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国，必须清楚双方竞争对其他国家、地区和机构的连锁反应。

第七，投资诸边和多边机制，并稳定管理全球公共产品的框架。双方都应该设定一个目标，使全球公共卫生和安全问题不受双边竞争的影响。

第八，维持地方层面在双边关系中的参与。地方行为体的参与能够帮助讨论聚焦影响其市民的实在问题，使公众更加了解双边关系中的风险和机遇。

第九，发展关键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因为领导人及其顾问的能动性对于有效管控双边关系中的摩擦至关重要。此外，投资“1.5 轨”对话，来探索管理危机和应对未来挑战的机遇。

美国外交

兰德公司分析“信息战”对美俄战略竞争的影响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网站 11 月 8 日发布该公司高级政治学家斯蒂芬·瓦茨 (Stephen Watts) 等执笔的报告, 分析了公共传播或“信息战”在美俄战略竞争中的有效性。

报告发现, 面对面的、重复的宣传是最有效的, 总体上比通过电视或网络进行的宣传对说服、认知和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负面和正面信息对激励行为改变的效果几乎相同。负面信息似乎比其他类型的信息更容易让人记住, 但也可能给其发送者造成负面影响。针对特定人群制定信息, 能够极大提高传播的成功率。在充斥大量信息的复杂环境中, 相互矛盾的信息往往相互抵消。

报告认为, 为了与在俄罗斯的“信息战”中取得优势, 美国应该: 积极开展传播活动, 强化西方政治机构和规范。如果没有其他信息与之较量, 俄罗斯的传播活动就会产生更大的效果; 对目标人群进行深度分析, 精准化传递信息; 致力于长期宣传, 并强调一致的主题; 通过当地行为体开展活动, 尽可能展开面对面的宣传; 投入资金评估传播活动的有效性; 避免与俄罗斯展开针锋相对的“信息战”, 在制定与俄罗斯的竞争战略时, 应该认识到俄罗斯的弱点与美国不同。

美国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接触以与中国竞争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近日登载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 (Paul Haenle) 的文章称, 拜登团结亚欧盟友和伙伴对华施压,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忽略了发展中国家这一更大

区域。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集中精力与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和伙伴加强关系，但中国在试图影响很多华盛顿的欧亚盟友的同时，也专注于一个更大的地理空间，包括非洲、中东、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在这些地区，美国的经济和发展项目滞后。

拜登承诺向其他国家捐赠 5 亿剂疫苗，并加大对易受气候变化干扰的中低收入国家的援助，但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往来严重不足。此外，“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B3W）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这两个最重要的发展工具尚未发挥实质作用。前者被批评为“解决第一世界问题的第一世界框架”，后者则一直专注于中高收入国家的项目。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的根本问题是难以盈利，这也是“重建更美好世界”鼓励私人资本，以及以盈利为目的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受到限制的原因。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应为当地公司能够自主承担的项目提供长期、极低利率的贷款，特别是关于修路、提供清洁自来水以及扩大和改善医疗基础设施的项目。此外，拜登政府应该将以人为本的发展项目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把帮助因疫情致贫的数亿人口作为重要任务。

尽管国内外挑战日益增加，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理应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接触，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证明民主社会能够推动全球发展。

莫让北约成为遏制中国的工具

美媒《新闻周刊》网站 11 月 6 日登载美智库“国防重点”（Defense Priorities）助理研究员简·格伯（Jan Gerber）的文章称，使北约成为遏制中国的工具，只会让欧洲盟友迅速成为美

国的累赘。文章摘要如下：

近期，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崛起使北约对美国变得更有意义。为了让北约国家能够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同步，斯托尔滕贝格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战略。他一方面试图让华盛顿相信北约盟友依然是美国在欧洲大陆的资产，另一方面还要说服 27 个具有不同地缘环境和安全优先事项的欧盟北约成员国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

尽管中国对欧洲国家构成了一系列挑战，但与俄罗斯相比，中国不会对欧洲构成直接安全威胁。然而，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却会对欧洲大陆的安全带来明确的影响。华盛顿近三届政府的表现都让欧洲领导人担心美国对欧洲防务承诺的未来。

由于欧洲遏制中国的承诺主要是为了让美国继续驻扎在欧洲，而不是出于硬性的安全利益，因此它不太可能改变中国的考量。让几艘护卫舰轮流游弋于印太地区，是欧洲安抚美国的一种低成本、象征性的“贡献”，以便拖延完全承担自身防御要做出的必要牺牲。

北约不应消极地等待美国卷入某一场太平洋危机，对俄罗斯的入侵毫无防备，而是应该转向地缘政治分工，让欧洲大国发展自主军事能力。欧洲应当为自己竭力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而未对不断变化的安全局势做出调整的行为承担责任。但美国也应该小心，不要诱骗欧洲盟友采取象征性的行动对抗中国，同时错误地相信华盛顿会永远在欧洲陷入危险时拯救它。

美国如何在外交政策中平衡民主与安全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近日发布其研究项目高级副主

席托马斯·卡罗瑟斯 (Thomas Carothers) 等合著的报告, 探讨了美国如何应对其外交政策中的民主-安全困境。

报告称, 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团队希望将捍卫民主和保护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但他们面临着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美国与许多不民主或民主倒退的政府保持安全合作关系。这种情况经常会导致政策上的两难: 就伙伴国政府的政治缺陷与之对抗, 可能会引发敌意, 从而危及这些政府提供给华盛顿的安全利益。然而, 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对他们网开一面, 将削弱美国价值观诉求的可信度, 助长一种破坏性的看法, 即美国只会对其对手或与其战略无关的国家推行民主。

在拜登担任总统的第一年, 美国与埃及、匈牙利、印度、菲律宾、波兰、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不同国家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这种矛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类复杂问题, 美国的决策者需要摒弃临时性做法和与更广泛战略无关的决策。

报告认为, 为了以连贯一致的方式制定政策, 并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加强支持民主和人权的努力, 在与特定国家的关系面对民主-安全困境时, 决策者应首先权衡五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第一, 与特定外国政府的伙伴关系将有助于促进哪些具体安全利益? 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安全伙伴关系如何进一步促进美国利益的观点趋于僵化。决策者必须首先确定和阐明特定安全伙伴关系涉及哪些利益, 这是制定良好政策的基础, 但在美国政策的日常执行中往往被忽视。

第二, 美国希望特定伙伴关系提供的安全利益与该伙伴存在问题的民主状况有何关系? 不同的关系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情景: (1) 美国的安全利益与伙伴的政治状态没有密切联系; (2) 如果伙伴国的民主状况得到改善, 可能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 (3) 如果伙伴国的民主得到发展, 美国的安全利益可能会受到

损害。此外，若美国与某个国家的关系涉及多种不同的安全利益，那么美国的安全利益和伙伴国民主进步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关系。

第三，若美国就民主对某个安全伙伴施加更大压力，美国的安全利益会受到怎样的威胁？决策者应该认识到，低调处理民主或人权问题并不一定能确保安全伙伴会在重要的安全问题上继续合作。例如，美国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反自由行为做出了相对温和的反应，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不同时期威胁要中断与美国的防务合作。

第四，美国如何以最有可能推动民主进步的方式，向政治上有问题的安全伙伴提出民主和人权问题？若有可能，呼吁某个政府关注民主问题应该强调该政府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仅仅诉诸一般的民主原则和规范。比如，强调印度对外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的打击可能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强调埃及法律机构的政治化可能阻碍外国投资。这些论点必须仔细斟酌，以适应当地情况。

第五，通过更有力地推进民主，美国可以合理地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决策者经常为民主和人权进步设定不切实际的高标准，然后因为觉得无法实现目标而放弃。决策者需要评估伙伴国混乱的民主和权利状况的原因、动机和模式，以便评估美国加强接触是否会促使该国领导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反民主状况的严重程度，或限制新的反民主措施。

美国政治/其他

共和党游说者称美企正在重返共和党的阵营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11 月 8 日载文称，共和党近日在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选举中的强劲表现，似乎说明共和党有

望在 2022 年夺回国会多数席位，美国企业界因国会骚乱事件对共和党冷淡下来的态度再次升温。文章摘要如下：

许多共和党游说者表示，他们认为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资金很快就会流向共和党议员。曾与特朗普政府有联系的共和党顶级说客布莱恩·巴拉德(Brian Ballard)接受采访时称，共和党的竞选形势终于开始好转，他的客户表示“他们将在未来半年里更加积极地支持共和党人”。

在 1 月 6 日国会骚乱发生后，许多大企业，如康卡斯特集团、万事达卡和美国运通，誓言不向反对选举结果的共和党议员提供政治捐款。其他一些公司则完全暂停了政治捐款。后来，波音等公司放弃承诺，向反对选举结果的共和党成员捐款。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选举结果可能会加速这一趋势。

与共和党有联系的游说者表示，非大选年的结果对共和党的筹款来说是个好兆头。一些公司正在采取行动，恢复与一年前疏远的国会成员的关系；还有公司计划在 2022 年初恢复捐款，或者正在就如何重启捐款进行谈判。

“美产美销”法案将削弱美国的竞争力

美国《国会山》网站近日载文称，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近日提出了一项旨在缓解当前供应链危机，支持国内制造业的新法案，其核心是要求在美国销售的指定商品的绝大部分部件均来自美国，用贸易政策术语来说，即当地成分要求（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虽然霍利的提议可能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具有吸引力，但它削弱了美国数十年来打击其他国家使用当地成分政策损害美国竞争力的努力。简言之，当外国政府强制实施当地成分要求时，

就会损害美国公司在这些市场的竞争能力。这些要求可能会迫使美国公司使用不合标准的原料部件，也损害了美国企业向国外市场出口商品的能力，削弱了它们的全球增长潜力。

这些担忧正是美国贸易政策历来强调在贸易协定中严格限制或禁止当地成分要求规则的核心原因。事实上，多年来包括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针对贸易规则中当地成分要求的反对声愈发强烈。

文章认为，拟议中的立法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供应链问题。与此同时，该法案使美国在“扭曲”市场的贸易政策方面“与中俄为伍”。霍利的提议将与美国对其伙伴国的贸易承诺相抵触，并可能引发一系列针对美国的贸易协定诉讼。在美国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来制定新的贸易规则以应对中国挑战之时，它承担不起在贸易领域制造新的紧张局势。

CSIS：美国如何赢得科技人才竞赛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近日登载其国际安全项目研究员雷姆科·泽维斯路特（Remco Zwetsloot）执笔的报告，建议美国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移民制度改革，以赢得科技人才竞争。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最强大的、或许也是唯一持续的、不对称的优势是其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的能力。然而，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糟糕的移民政策而浪费这一优势。如果不对 STEM 移民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美国将难以保持长期竞争力，或实现半导体供应链安全、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创新等短期技术优先事项。

在中国进一步扩大其国内优势和美国失去更多国际人才之前，两党就 STEM 移民达成的共识必须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此过

程中政策变化应至少实现三个目标：

第一，改革 STEM 移民制度以促进国家安全。美国的国家安全依赖于美国技术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而后者往往与 STEM 的概念紧密相连。移民改革可以针对广泛的 STEM 领域，或更具体地关注“关键和新兴”领域。

可采取的立法政策选择包括：取消高级 STEM 毕业生的绿卡上限；为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工人创建新的绿卡类别；可选实习训练（OPT）对美国留住国际 STEM 毕业生和美国公司至关重要，国会应将 OPT 写入法规，以保护其免受质疑。

可采取的行政政策选择包括：回收大量未使用的绿卡；明确并扩大 O-1 “杰出人才签证”的范围；向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工人发放“国家利益豁免”（NIW）。

第二，确保移民改革补充国内劳动力投资。如今，仅靠国内人才已无法满足美国科技体系的劳动力需求。以下建议将有助于确保 STEM 移民措施惠及国内人才，并得到政治联盟的广泛支持。

可采取的立法政策选择包括：创建一个专门的企业家（或创业）签证，通过允许更多的外国人才创办高科技公司，该签证将促进美国的创新，并为本国工人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签证申请费，以为国内学生和工人提供额外的 STEM 培训提供资金。

第三，在保持开放系统的同时保护研究和科技。可采取的立法政策选项包括：建立新的公私研究安全伙伴关系；优先考虑并资助开源的科技情报分析活动。可采取的行政政策选项包括：有针对性地执行特朗普颁布的第 10043 号总统公告。该公告禁止与“执行或支持”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机构有关的中国毕业生和研究人员获得签证；简化科学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流程；在研究安全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上与盟友和伙伴合作。

弗吉尼亚州“翻红”暴露民主党的弱点

《纽约时报》中文网网站 11 月 4 日载文称，共和党在弗吉尼亚州的复苏，以及在稳固的蓝州新泽西州取得惊人的优势，向民主党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文章摘要如下：

在本月初举行的美国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共和党提名的私募股权高管、政坛新人扬金（Glenn Youngkin）以 51% 比 48.3% 的得票率击败了民主党籍前州长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在新泽西州，民主党人墨菲（Phil Murphy）以极微弱的优势险胜。在明尼阿波利斯，选民否决了进步人士推动的一项投票议案，该议案将用一个公共安全部门取代警察局。

五年来，民主党凭借破纪录的投票率赢得了胜利，是因为选民们渴望推翻一位他们认为不称职、制造分裂、糟糕之至的总统。但弗吉尼亚州的选举结果表明，一旦抵抗对象下台，这种抵抗政治的局限性就出现了。

民主党人在郊区人口众多的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遭遇的挫折表明，保守派正在猛烈反击民主党倡导的围绕种族和身份认同不断变化的道德观念。同时，共和党人不断寻求将学校变成国家文化战争的下一个战场。

对民主党人来说，这为他们敲响了警钟：反特朗普力量的浪潮曾令他们掌握权力，如今在厌倦了抗议、回到无所谓心态的基本盘选民心中，这股浪潮已变成了冷漠。或者，在政治上更危险的是，民主党的势头已经被一种对国家现状的不满情绪所取代，尽管拜登在竞选中做出了种种承诺，但美国还没有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正常状态。

在扬金正式赢得选举之前，民主党的策略师们就已经呼吁党内进行研究，审视继续重点强调特朗普是否还是最佳策略。

非大选年选举从来都不能完美地预测未来的成败。甚至在弗

吉尼亚州的选举于 8 月下旬趋于紧张之前，民主党在全国的形势就已经不妙了，他们可能会在选区重划中失去席位，并面临总统所在的政党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失去席位的历史趋势。

因靠近华盛顿，弗吉尼亚州的选举往往与国家政治交织在一起。因此，麦考利夫的失败与对政府日益恶化的看法很难割裂开来。《华盛顿邮报》与沙尔学院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大选日的前一周，弗吉尼亚州的潜在选民不满意拜登工作表现的比例为 53% 比 46%。该州 44% 的选民强烈不满意总统的表现，强烈支持总统的选民只有 21%。

更令民主党人担忧的是，现在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人和麦考利夫的竞选活动未能解决这种衰退感背后的原因：通货膨胀导致食品和汽油成本上升，对学校的失望增加，供应链挑战以及犯罪问题。

左派指责民主党未能推动更广泛的议程，包括取消“阻挠议事”（filibuster）以便通过保护投票权法案等自由派优先事项。政治战略家们担心，民主党没有充分宣传该党为帮助这个受新冠病毒蹂躏的国家所做的工作，以及他们为何没能在对其选民基础来说很重要的问题上取得成果。